



黄河故道及莫河改道

《山海经》与禹河故道

人类的文明史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

自远古黄河河道雏形初定至禹治水后形成禹河故道,地质运动已经持续了上百万年。在禹之前人类文明并无文字记载,黄河虽然在整个华北平原漫流游荡,其活动范围也被周围山脉所严格限定:黄河流出山陕峡谷以后,北有燕山,西有太行山,南有大别山,东有泰山和山东半岛的丘陵高地。从总体格局来看,经天地造化而成的黄河,迁延于燕南山麓与大别山北侧之间的巨大冲积扇间,而鲁西南地区的丘陵高地,作为冲积扇的中轴,则成为华北平原上淮河、海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

近现代的地质勘查证明,禹河故道是确切存在的。即便我们今天用所谓科学的态度来质疑古代史学研究中的“经义治河”,也完全不必视之为迂腐,因为历史已经把这条河道归功于代表了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禹身上。

《山海经》是目前流传下来最古的一部书。

书中以昆仑为坐标记述了黄河经禹治理后的流路,“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这也就是形成于公元前21世纪、经人类社会管理而又自然流动的黄河河道了。

因《山海经》语焉不详,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据传《禹贡》为禹所著)又对这一段描述做了进一步猜测,认为其“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用今天的地名来描述就是:自积石山导河,曲折流至山、陕交界的龙门,南到华山的北面,再向东经过洛河转弯处,达到浚县附近的大伾山,向北流入大陆泽,又向北分若干条支流,然后注入渤海。

禹河故道,便是黄河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第一次定位。

而黄河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地位也是特殊的。

史书把古代中国的四条大河“江、河、淮、济”称为“四渎”,即四条自有源头并独流入海的大河。

到东汉时,班固在《汉书》中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认为黄河是所有大河的起源,“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

河源考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那么,黄河的源头在哪里?

《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对禹河故道的描述里都有“积石”之说,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也曾有诗云:“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这给人的印象就是:找到了积石山,也就离河源不远了。

但实际上,长久以来,人们对黄河河源争议不断,正是因为不知道积石山到底在哪里。各地为争河源,无不竭尽全力。为证明积石山在其境内,1913年的民国政府甚至将河州(今甘肃临夏县)改名为导河县,其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进藏,松赞干布“迎亲于河源”,据考证就是在青海玛多县的星宿海。这里海拔4300米,水草繁茂,降雨丰沛,整个湖区面积300多平方公里,星罗密布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湖泊,在太阳照耀下繁星点点,灿若银河。一直很好奇是哪位先贤有如此曼妙的想象力,或许他也曾真诚地以为这里便是星星的寓所,才有了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星宿海。

在古代历史上,清朝可能是距离河源

真相最近的时期,当时“屢遣使臣,往穷河源,测量地度,绘入舆图”。康熙五十六年(1717),朝廷派出的使臣中有一个喇嘛,叫作楚儿沁藏布,发现星宿海之上还有三条河流,惊喜之余,他溯源直上,终于发现了上游的“古尔班索罗漠”,即我们今天所说黄河河源的三条支流——约古宗列曲、卡日曲和扎曲。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次河源查勘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楚儿沁藏布等人成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发现者。两年之后,清政府铜版《皇舆全览图》第一次在地图上标注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和名称,这也是世界地理测绘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1952年,中国确定约古宗列曲(当地藏民称之为玛曲)为黄河正源,这也正是楚儿沁藏布等人发现星宿海之上三条河流中最古老的一支。

第一次大改道

禹治水后形成的“禹河故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是很稳定的。

地质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由于整个华北平原的北段地势下沉,地势低洼且比降较大,而且拥有大量湖泊湿地,足以容纳黄河从黄土高原挟带下泄的泥沙,因此禹河故道的流路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不过,当时整个社会却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

禹的儿子启以武力夺取了帝位,远古的“禅让制”就变成了“家天下”,从此以后,部落之间就开始了无休止的厮杀征战。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新型的统治机构——国家的产生。从商朝开始,禹时期落后的部落联盟制逐渐被废除,诸侯国也就应运而生了。

等到了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时期,诸侯国一度多达数百个,而此时的黄河也由禹治水初期的低洼河道逐步向“地上河”转变了,各诸侯国也开始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大量地修筑黄河堤防以抵御洪水。这一时期,大陆泽产生了严重的淤积,不断抬高的洪水位使得黄河经常发生满溢或溃决。特别是北面的淤高不断增加,这也使得黄河河道有了持续南向迁移的趋势。

禹河故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历史上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大改道。

清初胡渭所著《禹贡锥指》记载:“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今浚县,淇河、卫河合流处)东行漯川,又经滑台城,又东北经黎阳县南,又东北经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今河南滑县),河至此与深川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渚。”

也就是说,整个河道大概向东南方向平移了一百公里。按今天的说法,改道后的黄河大致流经今河南濮阳、河北大名、山东德州等地,经沧州北而东入渤海。这条流路一直延续至西汉末年,我们不妨称之为春秋西汉河道。

这次改道是黄河下游河道发育演变史上一次重要转折。在接下来数千年的变迁过程中,黄河基本上是在禹河故道以南迁延演变,海河流域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酝酿,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水系。

清·魏源预测改道

历史上对黄河改道预测最准的是清代的魏源。1852年魏源在其《筹河篇》中明确提出明清时期南向入淮的黄河河道将会改道北流,由大清河(古济水)入海。

那时候,没有GPS技术,也没有实测地形断面,甚至你从城里到郊外的河边看看也要坐上驴车跑两天,可是,魏源却做到了极致。在其《筹河篇》发表后仅三年,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北流,并且改道后流经线路都几乎和他说的模一样。

我们不妨再次站在明清故道的面前,重新回顾一下魏源的分析,看看他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他首先从地势变化上分析河道必将要改道走北流的原因——“地势水性使然”,进而指出:

河、济北流也,而泰山之伏脉介其中,故自封丘以东,地势中隆高起,而运河分水龙王庙,遏汶成湖,安流南北以济运。是河本在中干之北,自有天然归海之壑。强使冒干脊而南,其利北不利南者,势也。

对于北流,他“审地势水性如之”,又做了进一步分析:

北条有二道:一为冀河故渚,史记所谓禹载之高地者,今不可用。上游即漳水,下游至天津静海县入海,皆禹河故道,其他亦高,故不可用。一为山东武定府之大清河即济水、小清河即漯水,皆绕泰山东北,起东阿,经济南,至武定府利津县入海,即禹河为二渠,一行冀州,一行漯川者也。自周定王时,黄河失冀故道,即夺济入海,东行漯川,故后汉明帝永平中,王景治河,塞汴归济,筑堤修渠,自荣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汉千乘即今武定利津县。行之千年。

他继续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分析,主张因势利导,尽快实施人工改道北流,以免黄河自行改道造成严重后果,迫切之感溢于言表:“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人力予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虽非下士所敢议,而亦乌忍不议!”

言外之意是,我虽人微言轻,你们可也要听啊。

魏源不但把改道北流的原因说清楚了,他还把历代治河人物的得失评价了个遍,并按水平高低进行排序:

“贾鲁不能坚持初议,其识尚出余阙之下”,余阙比贾鲁水平高。

“明以来,如潘印川、靳文襄,但用力于清口,而不知徙清口天究,豫,其所见又出贾鲁之下”,贾鲁又比潘季驯、靳辅水平高。

对于王景治河,他虽然承认是“禹后一大治”,但也并不是很服气,他认为并非其个人水平高,而是由于当时的河道地势和水性造成的,“以地势,则上游在怀庆界,有广武山障其南,大伾山障其北;既出,即奔放直向东北,下游有泰山支麓界之,起兖州东阿以东,至青州入海,其道皆亘古不变不坏”。

末了,他还代表所有治河专家反问:“我就不说了,难道大清国所有治河大臣的水平都不如王景吗?”原文如下:

诸臣修复之河,皆不数年、十余年随决岁塞,从无王景河千年无患之事。岂诸臣之才,皆不如景,何以所因之地势水性,皆不如景?其弊在于以河通漕,故不暇以河治河也。

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以前治河就是为了漕运,根本就不是为了治河。目的不纯,自然就难以专一而事功,这才是黄河不能根治的原因。

此刻,我们静静地体味着魏源的那份自信与骄傲,不禁油然而生对昔人荣耀的向往,精神亦为之一振。或许,这就是所谓人格的力量吧。

对于魏源,其成名并非缘于成功地预测了黄河改道,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成为清朝洋务运动时期重要的指导思想。

应该指出,虽然魏源预测黄河改道北流是最准的,但却并不是最早的。早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工科给事中李廷钦就上疏请求改道大清河以分杀水势。

毕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当皇帝当然也就不知道黄河改道有多难。

对于这份洋洋洒洒近千言、语极谦逊的奏章,乾隆颇不以为然,大笔一挥:“此奏甚谬,已有旨了!”即便是两百多年后的今天,透过奏章,仿佛仍能感受到乾隆帝那一脸的怒气。

节选自《极简黄河史》



书名:《极简黄河史》
作者:杨明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定价:32.00元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若说起黄河,大概会给人沉重的感觉。一则养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让人油然而生敬重之意;二则由于历史上多有洪灾泛滥之事,凭空令人生出几分悲凉。总之,让人难以放开了来说。

年岁日长,又多读了些书,渐渐发现围绕着黄河的变迁,历史上许多人物十分有趣。从皇帝大臣到农夫百姓,从凡夫俗子到大家名流,或聪慧或鲁莽,或耿直或狡猾,所谓形态万千,风采各异。于是想,不如也翻出他们的掌故来,以个人之纪事管窥黄河之历史:一则避免了我之天生愚钝应对宏大历史场面的尴尬,二则真实而有趣的小人物或许因贴近生活而更受读者诸君喜欢。这也正是我写这本书的缘故了。

历史因人而生,历史也因人物而生动。

——《极简黄河史》自序节录



黄河第一次大改道示意图

绘图:杨明